

列 宁 怎 么 办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

列 宁

怎 么 办 ？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

В. И. ЛЕНИН
ЧТО ДЕЛАТЬ ?

Наболевши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

列 宁
怎 么 办 ?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 大 林

人 民 军 队 出 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零二工厂印刷
1971年4月北京

目 录

序言	3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6
(一) 什么是“批评自由”?	6
(二) “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10
(三) 俄国的批评派	15
(四) 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22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28
(一) 自发高潮的开始	29
(二) 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33
(三) “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	42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51
(一) 政治鼓动以及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观点	52
(二) 马尔丁诺夫究竟怎样加深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62
(三) 政治的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66
(四) 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71
(五) 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74
(六) 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90
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93
(一) 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94
(二) 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98
(三) 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105
(四) 组织工作的规模	120

(五) “阴谋”组织和“民主制”	126
(六) 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134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	144
(一) 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	145
(二) 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	150
(三) 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组织?	162
结束语	168
附录 《火星报》同《工人事业》杂志实行统一的尝试	171
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	179
注释	180

怎 么 办 ？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¹

“……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
而党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则是党的
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
巩固的……”

（摘自拉萨尔 1852 年 6 月 24 日
给马克思的信）

写于 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

1902 年 3 月第一次用单行本刊印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 1907 年
出版的弗·伊林《十二年来》文集的
原文作过校订

原文是俄文

中文选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5 卷，
这次排印第二版时，由译者根据原文
重新作了一次校订



序 言

照作者的原定计划，本书的任务是要详细发挥《从何着手？》（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一文^①中所发表的那些思想。我们应当首先向读者致歉，在那篇文章中所许的诺言（这些诺言在答复许多私人询问和信件时也一再重复过）履行得太迟了。这样迟缓的原因之一，是去年（1901年）6月间曾经试图把所有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当时自然应当等待这次尝试的结果，因为这次尝试如果成功，我们也许就要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火星报》对于组织问题的观点；无论如何，这样的成功可以保证很快消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种派别的现象。读者知道，这次尝试结果失败了，而且，正象我们在下面将要竭力证明的那样，《工人事业》杂志在第10期上重新转向经济主义以后，这次尝试也不能不失败。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但因而也就更为牢固并能在各种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别作坚决的斗争，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情。因此本书的原定计划，也就有所改变并且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的主题，本来应当是《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我们的组织任务，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作者早已感觉兴趣，还在一次试图使《工人报》复刊（历次尝试都没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

有成功)的时候(见第五章),就想在这个报纸上提出这些问题了。但是,原定计划,即在本书中只分析这三个问题,并且尽可能用正面叙述方式说明自己的观点,而不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论战方式的计划,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而根本无法实现。一方面,原来经济主义比我们所设想的要顽强得多(我们所用的经济主义这个词是广义的,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篇可以说是定出了本书大纲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的文章已经说明这一点^①)。现在已经很明显,对于解决这三个问题所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什么局部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经济主义者看见我们在《火星报》上实际宣传我们的观点而表示茫然不解,这显然说明我们往往简直是各讲各的话,如果我们不 ab ovo^②讲起,便什么也不可能讲清,所以必须作一次尝试,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向一切经济主义者作一番系统的“解释”。于是我就决定作这样一次尝试,来“解释”一番,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会使本书的篇幅大大增加,并且使出版日期推迟,但是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履行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所许的诺言。所以,除了为出版迟缓致歉之外,还要为本书文字修饰方面的很多缺点致歉,因为我不得不非常匆忙地写作,而且经常被其他各种工作所打断。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仍然是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不得不从两个比较一般的问题谈起:为什么象“批评自由”这样一个“无害的”和“正常的”口号,对我们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为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80—287页。——编者注

② 从头。——编者注

什么我们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对于群众自发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谈不拢？其次，本来是要叙述我们对政治鼓动的性质和内容的观点，现在则变成了说明工联主义政治与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本来是要叙述我们对组织任务的观点，现在则变成了说明经济主义者认为满意的手工业方式与我们认为必须建立的革命家组织之间的区别。再次，人们用来反对全俄政治报“计划”的意见越是没有根据，人们越是不从实质上回答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问题，即我们怎样才能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组织的问题，我也就越是要坚持这个“计划”。最后，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希望指明以下几点：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防止同经济主义者完全决裂，但是这一决裂毕竟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工人事业》杂志已经具有一种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作用，因为它最充分和最突出地表现出来的不是彻底的经济主义，而是那种构成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一个**整个时期**的特点的混乱和动摇；所以我们同《工人事业》杂志进行的初看起来似乎是过分详细的论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彻底结束这个时期，我们就不能前进。

尼·列宁

1902年2月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

“批评自由”——这显然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党人同民主党人彼此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援引批评自由，初看起来，简直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奇怪的事情。难道在先进政党中间，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证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那个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这样想：“好象不是这么一回事吧！”“这个口号大概是一种暗号，象外号一样，用成了习惯，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其实，谁都知道，现代国际^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了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有时炽烈起来，火焰腾腾；有时

① 我要顺便说明一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个派别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从前，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²之间，盖得派与可能派³之间，费边社分子⁴与社会民主派之间，民意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始终纯粹是个别国家范围内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个别国家的特征，它们可以说是在各种不同的范围内发生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派在这场第一次与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也许会充分地巩固起来，足以消除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吧？

又静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点伯恩斯坦已经十分肯定地**讲明**，米勒兰已经十分肯定地**表明**了。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斯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头头是道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布“**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象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

于是，人们在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很多小册子中或在许多学术著作里，都已经进行了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一切出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青年，都有系统地受到了这种批评的教育；所以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①一样，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

^① 此典出自罗马神话，丘必特是掌管众神的最高之神，密纳发是手工艺、科学和艺术、教师和医生的保护之神。相传密纳发女神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头戴盔帽、身披铠甲、手执宝剑。因此，人们常常借此来比喻某人或某事一开始就完备无缺。——译者注

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

其次，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批评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明白，那末法国人已经设法把“新方法”具体表明了。法国在这一次也证明了它真是不愧享有历来的名誉，即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它的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结局总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彻底”。（见恩格斯为马克思的《Der 18 Brumaire》^①一书写的前言⁵）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在民主制方面具有比较发展的政治条件，所以他们能够立刻转到有其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做出了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都来极力为米勒兰辩护，并且对他大加赞赏了！的确，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公开承认这一点的勇气，那末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统治，那末社会党人阁员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经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谛之后，仍然留在内阁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向那目前恰好被法国社会党人叫做绞架、鞭子和流放所（knouteur, pendeur et déporteur）专家的沙皇致贺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名誉扫地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这种社会主义意识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来的却只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听起来颇为响亮的草案，这种改良真是微小到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些！

^① 《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服装，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是人们曾经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最富有抢掠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劳动者。现在所使用的“批评自由”一词，也含有同样虚伪的内容。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了。而现在高喊“批评自由万岁！”，这太象那个空桶的寓言了^①。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崎岖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行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叫喊道：让我们大家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呵！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向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向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

^① 见克雷洛夫寓言《两只桶》。这个寓言讲有一辆车子运两只桶，其中一只是空桶，一路上晃晃荡荡，响声刺耳，弄得路人唯恐避之而不及。——译者注

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向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最近（第10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这个口号（“批评自由”），并且不是把它当做理论定理，而是当做政治要求，即为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国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这一问题而提出的。它说：“要达到坚固的统一，就要有批评自由。”（第36页）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两个十分确定的结论：1.《工人事业》杂志维护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2.《工人事业》杂志要求机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有活动的自由。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个结论。

《工人事业》杂志“特别”不喜欢的，就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爱作预言，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必将决裂”^①。

《工人事业》杂志编者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们觉得，关于社会民主

^① 把革命无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比做十八世纪革命资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雅各宾派即“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提法，见于《火星报》第2号（1901年2月）的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普列汉诺夫。无论立宪民主党人、“无题派”⁶或孟什维克，至今都很爱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至于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事实，现在人们却宁愿默不做声或者……把它忘掉。（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党队伍中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说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比拟，从马克思主义者笔下写出这样的话来，是很奇怪的，因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并不是象历史学家-思想家可以想象的那样，代表着彼此不同的气质或思潮，而是代表着彼此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一方面是中等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却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整个运动，它的一切（着重号是波·克里切夫斯基加的）派别，包括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在内，都是站在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第32—33页）

好一个大胆的断语！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听见过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实，即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施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呢？而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位作者究竟根据什么理由断定说“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也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他这种坚决维护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的说法，是没有拿出任何论据和理由来加以证明的。作者大概以为，他既然是在重复最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关于自己所讲的话，那末他的断语也就无须证明了。但是，判断整个派别时竟以该派别的代表人物关于自己所讲的话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吗？他随后所说的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绝对相反的类型或道路的“说教”（《工人事业》杂志第34—35页），难道不也是再肤浅不过的吗？你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承认完全的批评自由，法国人却不承认，而正是他们的例子充分表明那种“不肯容忍的害处”。

我们对此回答说：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简直是“按伊洛瓦斯基⁷方式”来观察历史的人，有时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些人的意见，要解释德国社会党的一致和法国社会党的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征，不必把军事的半专制制度和共和的议会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经济生活以及经济发展的情况拿来对比，不必提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历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论上的错误（米尔柏格、杜林^①、讲坛社会主义者^②），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错误（拉萨尔）的斗争——同时发生的事实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法国人互相争吵是因为他们不肯容忍；德国人彼此一致是因为他们都是些好孩子。

你看，用这种极端深奥的议论就“避开了”一事实，一件完全推翻了维护伯恩施坦主义者的言论的事实。伯恩施坦主义者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历史经验才能给予最后的彻底的解答。因此，在这一点上有最重要意义的正是法国的例子，因为只有法国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曾经在自己的德国同道们的热烈赞助下（而且有几分是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热烈赞助下——参看《工人事业》杂志第2、3期合刊第83—84页），试图独自站稳脚跟。这种援引法国人“不肯调和”的言论，除掉有其“历史的”（诺兹德烈夫^②式的）意义之外，就不过是企图用气忿

① 当恩格斯抨击杜林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倾向于杜林的观点的，当时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甚至纷纷公开地责备恩格斯，说他态度激烈，不肯容忍，用非同志态度进行争辩等等。莫斯特和他的同志们提议（在1877年的代表大会上）在《Vorwärts》（《前进报》）。——编者注）上不再登载恩格斯的论文，认为这些论文“绝大多数读者都不感到兴趣”；而瓦耳泰希（Vahlteich）则说登载这些论文使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说杜林对社会民主党也是有贡献的，“我们应当为党的利益而利用所有的人。假如大学教授们要彼此争论，那末《前进报》决不是进行这种争论的场所”。（1877年6月6日《前进报》第65号）你们看，这也是维护“批评自由”的例子，我国那些非常喜欢援引德国人的例子的合法的批评家和非法的机会主义者，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例子！

② 诺兹德烈夫是果戈里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喜欢争吵、招摇撞骗。果戈里称诺兹德烈夫为“历史”人物，因为他每到一处，都要闹出丑“史”和乱子来。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意义，即指此意。——译者注